

兩次天安門事件

周 玉 山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第三研究所副研究員)

摘 要

一九七六年三月底起，大陸人民在飽受文化大革命的煎熬之餘，借悼念周恩來的名義，在天安門廣場示威。四月五日，民眾與當局爆發衝突，最後以流血收場，世稱四五慘案，後亦稱第一次天安門事件。一九八九年四月中旬，北京學生又以悼念胡耀邦為名義，湧向天安門廣場，爆發更大規模的民主運動，迅即遍布大陸，中經五四運動七十年等因素的激盪，愈見波瀾壯闊。六月四日，中共下令軍隊進入廣場，沿途造成大量死傷，是為六四慘案，亦稱第二次天安門事件。

第一次天安門運動抗議的對象為毛澤東等人，第二次天安門運動抗議的對象為鄧小平等人。鄧小平原與廣大人民一樣，文革時屬於受害者，復出後又推行經改，自易獲得認同，但他的政治意識仍受毛澤東影響，以致重蹈覆轍。第一次天安門事件後因禍得福的鄧小平，第二次天安門事件卻避吉趨凶，究其主因，則在鄧小平一如毛澤東，不知民主為何物，偏偏兩次天安門運動都在追求民主，俱有五四運動的血緣。

兩次天安門事件的導火線，分別是悼念周恩來和胡耀邦。彼等在大陸享有高度評價，或與未居第一線領導，故不必負第一線罪責有關。第一次天安門運動展開不久即值清明，尚有悼周的形式，第二次天安門運動延續五十天，稍後即無悼胡的稱號，可見悼念死者為名，抗議當局為實。周恩來生前提出四個現代化，包括國防、科技、農業、工業，而不及於民主，群眾自不以此為滿足。學生要求正確評價胡耀邦時，否定「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提倡民主、科學、自由、人權、法治，以及反貪污、反官倒等，內容不止一端，倘胡耀邦在世主政，在同一體制之下，亦窮於應付。

兩次天安門事件有一共同點，就是傷亡人數成謎。第一次迄無官方統計，非官方的估算是當場打死約兩百人，受傷和拘捕五千人。第二次依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所言，軍警死亡二十三人，受傷約五千餘人；非軍警死亡二百一十八人，包括三十六名大學生，另受傷約二千餘人。非官方的估算則為：群眾學生死亡三千餘人，受傷逾萬，事後追殺者更不計其數。「勿為死者流淚，且為生者悲哀」，殺人的機器存在一日，無人可以保證倖免，生者的悲哀因此至深且厚。

關鍵詞：五四運動、四五事件、六四事件、毛澤東、鄧小平、趙紫陽、江澤民

* * *

C.E.P.S.

一、前言

天安門位於北京城中心，擁有世界最大的都市廣場，南北長八百八十公尺，東西寬五百公尺，面積四十四萬平方公尺^①。這樣的規模，來自中共政權的「好大」性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起，中共為展示權力，多次擴建天安門廣場，始有今貌。文革時期，毛澤東在天安門八度接見紅衛兵，廣場及周邊共出現將近一千二百萬的人潮，平均每次約為一百五十萬人，亦可說明其規模。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大專院校學生三千餘人，齊集天安門廣場，排隊南出中華門，向東交民巷各國公使館行進，沿途散發傳單，強調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反對政府在山東問題上屈服於日本。五四運動一旦爆發，萬方景從，連康有為也盛讚不已：「自有民國，八年以來，未見真民意、真民權，有之自學生此舉始耳」^②。康有為以一復辟人物，尚且對五四運動推崇備至，況論海內外新知識分子？學生立即獲得學術界領袖的聲援，並取得商人、工業家和工人的支持，不惜罷市罷工，與學生攻守一致，形成史無前例的聯盟，不久即收到宏效。天安門廣場本為明、清兩朝舉行大典之處，後因五四運動而留名青史，成為學生乃至民衆運動的勝地，一九四九年以前如此，以後亦然。

中共在野時多方利用五四運動，執政後則遭五四精神的衝擊，可謂天道好還。五四精神就廣義而言，可歸納為三點：愛國家反政府、尊民主反專制、重科學反迷信。進而言之，五四運動的動機在護土救國，本質上是民族主義兼民權主義的革命，目的在喚起民衆，躋中國於自由平等、富強康樂之境。欲達此目的，首須外爭主權，內除國賊，次須實行民主，發展科學，數十年來，已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共識。例如，一九五七年五月，大陸各民主黨派、工商界人士、知識分子乃至共產黨員爭取民主的呼聲，就以星火燎原之勢展開，其中青年學生的鳴放可謂最強音，此即新五四運動。顧名思義，五四精神正為該運動的主題。

一九七六年三月底起，大陸人民在飽受文化大革命的煎熬之餘，借悼念周恩來的名義，在天安門廣場示威。四月五日，民衆與當局爆發衝突，最後以流血收場，世稱四五慘案，後亦稱第一次天安門事件。一九八九年四月中旬，北京學生又以悼念胡耀邦為名義，湧向天安門廣場，爆發更大規模的民主運動，迅即遍布大陸，中經五四運動七十年等因素的激盪，愈見波瀾壯闊。六月四日，中共下令軍隊進入廣場，沿途造成大量死傷，是為六四慘案，亦稱第二次天安門事件。現根據當時公布的資料，及最近揭露的文件，分別析述兩次事件的內容，並比較其異同，總結其意義。

註① 「天安門廣場」，見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地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六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頁四八五。

註② 楊亮功、蔡曉舟同編，五四—第一本五四運動史料（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七十二年五月出版），頁一三〇。

二、第一次天安門事件

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的起因，在大陸人民群起反抗文化大革命，抗議的對象則直指毛澤東和四人幫。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直接目的，在與劉少奇爭權，而其根本動機，則在摧毀所有不合己意的思想，因此必須從意識形態下手。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他指使姚文元，批判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揭開文革的序幕。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他會晤卡博·巴盧庫時透露：「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對吳晗發表批判文章，在北京寫不出，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這個攤子開始是江青他們搞的，當然事先也告訴過我，文章寫好後交給我看看^③。」他同時表示，爲了戰勝修正主義，必須公開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揭發黑暗面，所以他催生了文革，但也製造了更多的黑暗面。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布通知，撤銷原來的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革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這份通知強調，大陸正面臨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高潮，「這個高潮有力地衝擊著資產階級和封建殘餘還保存的一切腐朽思想陣地和文化陣地」^④。從此，一場長達十年的浩劫正式展開，造成人力物力的損失，古今中外皆稱罕見。同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正式宣布，成立新的文革小組，組長是陳伯達，顧問是康生，副組長是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組員則包括謝鏜忠、尹達、王力、關鋒、戚本禹、楊欣、姚文元。其中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名單外的王洪文，後來合稱四人幫。這個小組名義上隸屬於政治局常委，其實只隸屬於毛澤東一人，中共中央也發出通知，在陳伯達生病或外出期間，小組的工作由江青主持^⑤。毛澤東透過江青直接領導文革的意圖，至此昭然若揭。小組後來逐漸取代中共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成爲唯一的文革司令部，毛澤東夫婦也就成爲一場浩劫的最大亂源。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學的聶元梓等七人貼出大字報，宣稱要打破修正主義的種種控制，「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劉少奇的名字，此時呼之欲出，毛澤東見狀，當然大加鼓吹。六月一日，他批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全文，並訓令第二天見報。七月二十一日，他對中央首長表示，這份大字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國巴黎公社宣言書，其意義超過巴黎公社。「我向大家講，青年是文化大革命大軍！要把他們充分發動起來」。他同時強調，坐辦公室聽匯報不行，只有依靠群眾，相信群眾，鬧到底，準備革命到自己頭上來。他最後說：「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⑥。」一九四

註③ 「毛澤東和卡博·巴盧庫的談話」（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收入中共機密文件彙編（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輯印，民國六十七年四月初版），頁一五。

註④ 「中共中央委員會『五·一六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收入中共機密文件彙編，前引書，頁一六七。

註⑤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九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頁一六九。

註⑥ 毛澤東，「對中央首長的講話」（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收入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彙編（增訂本）（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出版，民國六十八年八月初版），頁二二〇。

九年以前，毛澤東利用熱情單純的學生，協助奪取政權，文革時他重操舊業，藉以打擊政敵，初步得逞後，又發動軍隊鎮壓紅衛兵，也應驗了自己的話語。一九八九年六四前後，大陸民運人士重提此言，成為中共新的夢魘。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毛澤東覆信給清華附中的紅衛兵，熱烈支持他們聲討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及其走狗^⑦。八月十日，他到中共中央設立的群眾接待站，號召大家要把文革進行到底。八月十八日，它換上軍裝，戴上袖章，在天安門檢閱紅衛兵。至十一月下旬為止，他八度接見紅衛兵和革命師生，人數將近一千二百萬。在「誓死保衛毛主席」聲中，無所不為。據北京市公安局統計，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至九月底，不過四十餘日，全市就打死一千七百七十二人，抄家三萬三千六百九十五戶，驅趕出京的黑五類及其家屬，多達八萬五千人以上^⑧。這種無政府的狀況，發生在中共的首都，已有人間地獄的景象，而毛澤東聽之任之。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毛澤東接見「首都紅代會」負責人聶元梓、譚厚蘭、韓愛晶、王大賓等，彼等談到工人鎮壓紅衛兵，而黑手抓不出來時，毛澤東直言：「黑手就是我嘛^⑨！」這是對紅衛兵先利用後迫害的自供，他派了三萬人進入大學校園，其中包括新華印刷廠、針織總廠和中央警衛團。根據早期的統計，這雙文革最大的黑手，十年間造成至少三萬四千八百人的死於非命，以及五千億人民幣的經濟損失^⑩。文革還製造了數以百萬計的冤假錯案，被株連的群眾多達一億人^⑪，其身心受到的傷害可以想見，謂為中國有始以來最黑暗的十年亦不為過。現據大陸官方最新的統計，文革時有二千多萬人受到整肅與打擊，四百三十三萬八千多人非正常死亡^⑫。被污辱與被損害的數字如此龐大，宜乎人民要群起反抗了。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毛澤東接見埃及副總統時說：「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社會第一個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罵我是秦始皇。中國歷史分兩派，一派講秦始皇好，一派講秦始皇壞。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⑬。」這樣的話語，使人想起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他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心聲：「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

註^⑦ 毛澤東，「覆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一封信」（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收入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彙編（增訂本），前引書，頁二二二。

註^⑧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前引書，頁一八四。

註^⑨ 毛澤東，「召集首都紅代會負責人的談話」（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收入毛澤東思想萬歲（台北：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複製，一九七四年七月出版），頁一九五。

註^⑩ 嚴家其、高舉合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下冊）（修訂新版）（台北：遠流出版公司，民國七十九年二月初版一刷），頁八八五。

註^⑪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前引書，頁三一八。

註^⑫ 羅冰，「『毛文集』座談會發生武鬥」，動向（香港），第一八五期，二〇〇一年一月號，頁九。

註^⑬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前引書，頁三六二。

加以補充^④。」根據會議紀錄，毛澤東此時大笑。其實，他早就寫過，「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後來他越說越白，暴君的味道也越來越濃了。「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後來爆發的天安門運動，可謂歷史的必然。

一九七六年三月底，大陸人民借悼念周恩來的名義，在天安門示威。稍早，南京已有類似活動。稍後，杭州、鄭州、西安、太原、福州等地繼之。四月五日上午，北京群眾砸毀公安局的廣播宣傳車，湧向人民英雄紀念碑、人民大會堂、歷史博物館等處，並衝入廣場東南角的聯合指揮部，下午更以火焚之。晚間，民兵接到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命令後，在警察和軍隊的配合下「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即當場鎮壓人民。事後，北京衛戍區動員部隊，在廣場清洗了三天以上的血跡，並展開追捕行動，直到四人幫本身被捕為止。

天安門運動延續了一個星期，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從三月底到四月四日，是群眾和平示威階段；四月五日到六日，是群眾激烈抗暴階段；四月七日，是中共處置階段^⑤。三月三十日，北京市總工會工人理論組的二十九名職工，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南側，貼出了第一張抗議書，從此就有數以千計的大小字報和標語跟進，至四月四日達到高峰。

該日是星期天，天安門廣場的花海人潮中，觸目都是詩詞和條幅，包括「若有妖魔興風浪，人民奮起滅豺狼」、「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熱血湧心潮，痛詞壯征歌，我按三尺劍，犬物敢禍國？」、「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會已一去不返了」^⑥。由此可知，運動雖以悼周的形式出現，箭頭則指向毛澤東，這對於以「超過秦始皇一百倍」自詡的現代暴君而言，無異一個掌摑，證明大陸人民真正站起來了。

四月五日凌晨，中共當局調集了卡車、救火車和大吊車開進廣場，沒收花圈、詩詞並擄人。清晨，聞訊起來的憤怒群眾，終於和當權派爆發正面衝突。抗暴的有工人、農民、士兵、知識分子、學生、幹部和家庭主婦，也有共產黨員、共青團和少先隊員，他們父子相隨，兄弟結伴，夫妻同行，師生攜手，百萬群眾匯成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此次運動發生在中共建立政權後的第二十七年，證明了大陸人民在長期隱忍下的不甘就範，也暴露了中共統治的不穩。它為文革奏起了輓歌，也加速了毛澤東的死亡，天安門廣場正在毛澤東的臥榻之側，咫尺之處百萬民衆的怒吼，極權者也受震撼。

四月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據毛澤東的訓令，撤銷鄧小平在黨內外的一切職務，並任命華國鋒為黨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明言，鄧小平的去職與天安門事件等有關。此說旨在倒鄧，但予世人「鄧小平領導義舉」的錯誤印象。其實，當時鄧小平與外界隔絕，和運動毫無牽連，此為鄧派復出後所不諱言^⑦。誠如事件後被捕的

註④ 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收入毛澤東思想萬歲，前引書，頁一九五。

註⑤ 天安門抗暴事件真相（台北：中國國民黨大陸工作會，民國六十五年五月出版），頁六。

註⑥ 嚴家其、高舉編著，中國『文革』十年史（下冊）（香港：大公報出版，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初版），頁五七八。

註⑦ 「天安門事件真相一把『四人幫』利用人民日報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人民日報（北京），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曹志杰在答詢時陳言：「我們的行動完全是自發的，沒有人指揮，我們沒有什麼後台^⑩。」現場目擊的外國記者也指出，四月五日的抗議行動顯然不是有預謀、有計畫、有組織的，而且肯定沒有打起鄧小平的旗號，記者在廣場上幾個小時，從未看見或聽到他的名字。凡此皆可證明，四五天安門運動之功與鄧小平無關。

二十四年後，即二〇〇〇年六月，毛毛出版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強調鄧小平功在四五運動。「其實，每一個人人都知道，這場人民群眾的偉大抗議活動，雖然不是鄧小平直接指揮的，但是，無論從任何意義上講，鄧小平都是當之無愧的『總後台』」^⑪。她的理由是，鄧小平復出後的全面整頓，以及他與四人幫的針鋒相對，給大陸人民帶來了希望，增添了與四人幫鬥爭的勇氣。但是，這本全面歌功頌德的書，卻一再省略了鄧小平有關文革的言行。例如：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他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公開檢討：「對於我這樣犯錯誤的人，應該老老實實地向林彪同志學習，學習他高舉毛澤東思想的紅旗，學習他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這是我改正錯誤，力求做一點對黨對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途徑^⑫。」此後十餘年，他不斷發表類似的言論，換取信任與職位。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日，鄧小平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閉幕前夕，召集在北京開會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舉行座談會。此時文革業已結束，他仍然公開批判劉少奇，並肯定文革：「我們的黨是堅持馬列主義，堅持社會主義路線的，但有些人卻不要馬列主義，不要社會主義，這些人往往利用我們以為風平浪靜想當然的時候，暗中絆我們一腳，使我們四腳朝天，他們就趁機把中國帶到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去，劉少奇就是這種人^⑬。」劉少奇與鄧小平在文革時，同被打成反黨集團，結果前者慘死，後者倖存，倖存者鞭撻慘死者，這已非世態炎涼四個字所能形容。他同時表示：「要不是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把資本主義和馬列主義、社會主義之間的鬥爭，通過大字報、大鳴、大放、大辯論來使我們認識清楚，我真會讓劉少奇拉著鼻子走，這說明什麼？是我過了幾年太平日子，思想模糊了，路線搞不清楚，很多同志也會有這種錯誤，現在基本上扭轉過來了，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首功。所以說文化大革命的成績，主要的是保住了黨的本質，也保住了江山不變色，毛主席的偉大之處也就可以在這裡體現出來^⑭。」由此可知，政治的是非，事件的對錯，人物的忠奸，制度的好壞，鄧小平都有獨特的論斷。一波又一波這樣的言論，加上異乎常人的行動，他終於爬上權力的頂峰。四五運動反抗文革，他卻肯定文革，其女的「總後台」之說，實在值得商榷。

註^⑩ 王宏志編著，天安門廣場革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五月第一版），頁一〇。

註^⑪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六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頁四六八。

註^⑫ 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檢討」（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收入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編印，鄧小平（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出版，民國六十七年六月初版），頁二九四。

註^⑬ 鄧小平，「在北京召集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日），收入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編印，批判鄧小平資料，民國七十二十二月出版，頁一八六。

註^⑭ 同前註，頁一八七。

四五運動爆發後，中共指為「反革命政治事件」。事隔兩年七個月，即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當權派因本身政治利益之需，開始為之平反，聲明這完全是革命的行動，強調四人幫的鎮壓之舉才是反革命。「中國不是四人幫的；人民，只有人民才能決定中國的命運，只有人民才能推動歷史前進」^②。其實，中國也不是共產黨的。鳴放時期，人民大學的講師葛佩琦就指出：「共產黨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分子。搞得不好，可以；搞得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不為人民服務。共產黨亡了，中國不會亡^③！」鄧小平雖然和華國鋒一樣，也為第一次天安門事件平反，但稍後的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即逮捕魏京生並判重刑，說明了鄧式民主的本質。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第二次天安門事件爆發，更將此種本質大白於天下。

三、第二次天安門事件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澤東去世。十月六日，華國鋒下令逮捕四人幫，象徵文革的告終。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華國鋒漸被架空，鄧小平時代於焉展開。四人幫下台後，新當權派為轉移民憤，以示自己有別於前凶，乃一度允許各地設立民主牆，並鼓勵追述文革罪惡的傷痕文學出現，在這樣的環境下，大陸的民主運動高潮迭起，大字報和地下刊物等蔚然成風。一九七九年二月，北京之春刊出「民主牆贊」，堪稱其中的代表作：「西單一段白磚牆，靜靜地佇立在長安街旁，伴著電報大樓的鐘聲，注視著人民的動向。你既不高大雄偉，也不華麗漂亮，而是極為平常。在七十年代的中國，你發出了時代的呼喚，臨世的第一聲啼哭，就響徹環宇，威震四方。我們要民主！我們要科學！我們要法制！我們要四個現代化^④！」凡此呼籲，正是五四運動的翻版，但亦添加了時代的訴求。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北京公安局奉鄧小平之命，逮捕了魏京生，他獲罪的主要文章，是「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稍早的三月二十五日，*探索*雜誌發行號外，社論即為該文。他投身民主運動，目的在否定毛澤東式的專政，改革大陸的社會制度，使中國能在民主的環境中，發達生活與生產。該文的焦點人物即為鄧小平，魏京生說了重話，但都獲得驗證。「鄧小平要民主嗎？不要。他不願去瞭解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人民，他不願讓人民收回被野心家集團篡奪的權力。對於人民自發展開的爭奪民主權利的運動，他卻說有人借此鬧事，是破壞了正常秩序，要採取鎮壓」^⑤。於今觀之，

註^② 同註^①。

註^③ 葛佩琦，「共產黨亡了，中國不會亡」（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在人民大學黨委會座談會上發言），原載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中國青年報*，收入*大陸青年的怒吼*（中共原始資料彙編之二）（台北：黎明文化公司，民國七十二年六月出版），頁二七。

註^④ 愚民，「民主牆贊」，原載北京之春第二期，一九七九年二月，頁二〇。引自劉勝驥，北京之春（一九七八至一九七九）（台北：幼獅文化公司，民國七十三年三月出版），頁三二。

註^⑤ 魏京生，「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收入謝定華編，*魏京生啓示錄*（台北：聯亞出版社，民國七十年五月初版），頁六三。

鄧小平幾乎完全按照文中的論斷行事，而且屢試不爽。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期，大陸人民劫後餘生，自然望治心切，「讓鄧小平做做看」，成爲許多人的心聲，魏京生的火種，當時尚未燎原。八十年代起，鄧小平的政治面貌日顯，打擊異己的事例層出不窮，從清除精神污染到反自由化，從白樺事件到六四慘案，終於造就了無數個魏京生，接下第一個魏京生的火種，到處傳遞了。

五四精神至八十年代的大陸，又有了舉世矚目的展現。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九日，位於安徽合肥的中國科技大學，在一二九運動五十一周年時爆發了學潮，迅即蔓延大陸各地，規模之大，爲中共建立政權以來所未曾有。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免除科技大學副校長方勵之的職務，罪名是「在不同場合散布了許多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錯誤言論，背離了四項基本原則」，以及「企圖擺脫黨的領導和背離社會主義道路的辦學思想，給中國科技大學帶來極惡劣的影響，這些錯誤思想在這次科大學生的鬧事中充分暴露出來」。四項基本原則是中共的國策，背離者可謂罪孽深重。一月十七日，中共開除了方勵之的黨籍。

此次學潮的口號是「要民主」和「要自由」，上海交通大學並質問中共統治的基礎，同濟大學呼籲打倒官僚主義，南京地區的學生要求打倒專制，天津南開大學建議，效法菲律賓人民推翻馬可仕的起義，北京大學更指中共領袖爲暴君，其政權「在每一方面都與我們過往最暴虐的封建君主制度一樣」^②。如此激烈的言論，較之五四運動或新五四運動不遑多讓。總計一個月內，至少有一百五十所大學的青年加入示威行列，大陸各省除了西藏與青海，都有官員匯報學潮的消息。中共惶恐之餘，在上海、南京、北京、蕪湖、武漢、青島、太原、天津和四川各省市展開逮捕行動，對象包括大學生、留學生、知識青年、工人等，鄧小平且下令清算自由化的「頭面人物」，作家王若望與劉賓雁也被中共開除黨籍，益證方勵之事件並非特例。

一九八九年一月六日，方勵之致函鄧小平，指出該年爲中共建政四十年，也是五四運動七十年，有鑒於此，他建議大赦，特別是釋放魏京生和所有類似的政治犯。「無論對魏京生本人作如何評定，釋放他這樣的已經服刑大約十年的人，是符合人道的，是會促進良好的社會風氣的」^③。此函既出，北島、吳祖光、冰心、張潔、吳祖緜、湯一介、張岱年、嚴文井、馮亦代、蕭乾、金觀濤、李澤厚、龐樸、包遵信、蘇紹智、王若水、陳軍等三十三人，於二月十三日以公開信連署響應，致函對象則爲全國人大和中共中央，強調此舉將會創造一個有利於改革的和諧氣氛，也符合當今世界日益尊重人權的普遍潮流。二月二十一日，陳軍致函全國人大常委會，呼籲將魏京生等人大赦的問題列入議事日程，並以民主方式取得結論。二月二十三日，陳軍與北島在北京舉行記者會，宣布成立一九八九大赦工作小組。公安部的報告指出，「這是中華人民

註② 陳力生等編著，野火春風—中國大陸一九八六年學生民主運動紀實（台北：中國大陸雜誌社，民國七十六年五月出版），頁一〇六。

註③ 「方勵之致鄧小平函」，原載九十年代（香港），一九八九年三月，頁二三〇。收入張京育主編，自由之血民主之花—中國大陸民主的坎坷路（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出版，民國七十八年八月初版），頁四五。

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次這麼多人聯名上書，更是第一次公開宣布成立組織，要求政府大赦釋放政治犯」²⁹，因此強調必須密切注意這一新動向。

二月二十六日，許良英、于浩成、李洪林、張顯揚等六十餘人，在首都鋼鐵公司召開中國民主問題研討會，由胡績偉主持，會後致函中共中央，呼籲加速體制改革，並正視腐敗成風，「官倒」猖獗，物價飛漲，人心渙散，以及教育、科學、文化事業面臨的嚴重危機。他們建議在堅持改革開放的前提下，盡力使政治改革即民主化，與經濟改革同步進行，在廣大人民和有效輿論的監督下，才有可能實現「為政清廉」。至於民主化的首要條件，則是切實保證憲法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特別是言論、出版和新聞自由，此為安定團結唯一可靠的保證。他們請求中共中央，責成有關部門，釋放一切因思想問題而被判刑或勞動教養的青年，不再定罪。同時，他們呼籲盡可能增加教育和科研經費，提高知識分子的生活待遇。三月十四日，戴晴、陳奎德、王炎、嚴家其、遠志明、史鐵生、周輔成等四十三人，加入籲請釋放魏京生的行列。不過，由於魏京生是鄧小平欽定的罪犯，因此中共對上述的呼聲置若罔聞，唯有國安部等單位伺機而動。

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因心臟病去世，消息傳開後，不斷有人來到天安門廣場致悼。四月十七日起，大陸各大學悼胡的活動開始升溫，以湖南的湘潭大學為例，該晚一千名學生上街遊行，有人喊出「打倒鄧小平」、「鄧小平下台」、「打倒封建專制主義」。十八日零時，北京大學、人民大學、清華大學數千名學生向天安門廣場行進，沿途高呼「民主萬歲」、「自由萬歲」、「打倒官倒」。十八日清晨，他們在人民大會堂前靜坐，提出七項要求：一、重新評價胡耀邦的是非功過，肯定其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二、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平反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識分子。三、反對官吏貪污，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向人民公開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四、允許民間辦報，解除報禁，實現言論自由。五、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六、取消北京市政府關於遊行示威的十條規定。七、政府領導人公開檢討失誤，並透過民主形式，改選部分領導人³⁰。此外，他們還要求報紙公開報導、政府公開答覆此事。事實證明，他們的願望落空，但也因為如此，爆發了二十世紀中國最大的民主運動。

四月十九日深夜，北大的民主沙龍再度開會，討論「團結學生會」事宜，王丹宣布建立籌委會，領導學生運動，以後還要成立聯合全國高校的「團結協會」。會中公布十一條基本綱領，除了包括十八日的七項要求外，更明確提出釋放魏京生，並強烈要求鄧小平，具體回答十年改革教育失誤的原因。會上散發了「告北京高校書」，倡議共同成立「民主請願活動協調會」，統一領導已有很大聲勢的自發活動。論者指出，這是中共建政以來第一個非官方的學生組織，標誌著大陸學生運動進入了新紀元，可謂對共產黨統治體制的叛逆³¹。四月二十日，十萬學生和市民齊集天安門廣場，提出

註²⁹ 張良編著，中國「六四」真相（上册）（香港：明鏡出版社，二〇〇一年四月第一版），頁九一。

註³⁰ 同前註，頁一二三。

註³¹ 同前註，頁一五九。

針對鄧小平的「慈禧退休」等口號，上海、天津、武漢、合肥等城市應之。四月二十一日，包遵信、吳祖緇、嚴家其、李澤厚、北島、蘇曉康等四十七名知識分子，致函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呼籲加速大陸民主進程和政治體制改革，清除各級黨政機構中日趨嚴重的腐敗現象，解決各級政府普遍存在的軟弱低頭狀態，實現憲法規定的言論和新聞自由，確保大眾傳播媒介的輿論監督功能。「我們建議，黨和國家領導人認真聽取學生的願望和要求，直接與學生們平等對話，汲取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的歷史教訓，不能置之不理。置之不理，容易激起學生們的過激反應，不利於全國人民同心同德實現中華民族的現代化大業」^②。結果，鄧小平以坦克機槍見覆，製造了第二次天安門事件，不讓毛澤東和四人幫專美於前。

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的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北京近二十所高校的數萬名學生，在天安門廣場和西長安街兩側參與，會後延西單向西行進，高喊「反貪污、反腐敗」、「民主萬歲」、「科學萬歲」、「懲辦貪官污吏」、「新聞要講真話」等，再度說明遊行的主題已非悼胡，實指向中共統治下的弊端。四月二十三日，北京二十一所大學的學生代表在圓明園開會，成立臨時籌備委員會，是為有組織、有計畫的領導。同日，中共已調動兩萬部隊到北京，準備對付五四運動七十年期間的學生活動。四月二十四日，北大出現大字報，箭頭指向鄧小平，謂中國已沒有時間等強人去世才爭取民主，何況強人之後可能出現另一強人。同日，北京已有三十九所學校，約五萬名學生罷課，對中共而言，形勢極為嚴峻。

四月二十五日，鄧小平聽取李鵬、楊尙昆、喬石、胡啓立、姚依林、李錫銘、陳希同等人的匯報後，總結了學潮的性質：「這是一場有計畫的陰謀，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要向全黨和全國人民講清楚，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這場動亂^③。」稍後，經李鵬提議，曾建徽執筆起草了四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報社論，題目即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經李鵬和胡啓立審定，二十五日當晚，就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中央電視台播出，主要論點均為鄧小平的原文，一經推出，激起了更大的反彈，上海、天津、長春、杭州、南京、西安、長沙、合肥等城市的學生和市民，立刻遊行示威，抗議這篇社論，社會各階層也因此更為同情學運。四月二十七日，北京爆發四十年來最大規模的示威，學生隊伍中的口號有「旗幟鮮明地反對貪官」、「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好下場」等，可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

五月四日前夕，李洪林、于浩成、嚴家其、張顯揚、戴晴、張抗抗等人，發表「『五四』七十周年倡議書」，肯定學生的愛國行動，是五四精神在新時期的延續。「民主當然不能一蹴而就，但是我們不能同意所謂中國人民素質太低，因而需要推遲民主的怪論。事實證明，缺乏民主素質的，恰恰是那些害怕民主的官員」^④。此語說

註② 「四十七名知識分子公開信」（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收入張育主編，自由之血民主之花—中國大陸民主的坎坷路，前引書，頁九九。

註③ 中國「六四」真相（上册），前引書，頁一九七。

註④ 「大陸知識分子『五四』七十周年倡議書」，收入火與血之真相（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紀實，一九八九年）（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一九八九年十月出版），頁四一六。

明大陸的民智已開，但官智未開。五月四日，北京學生高舉「自由、民主、科學」、「反對貪污、打倒官僚」等旗幟的遊行隊伍，受到市民夾道歡迎，也有標語強調「發揚五四、超越五四」^⑤，顯示大陸人民望治心切，不以七十年前的主張為滿足。據中共中央得到的報告，當天大陸有五十一個城市的學生遊行示威。

此後學生絕食抗議，但中共無動於衷。五月十七日，嚴家其、包遵信、鄭義、徐剛、王魯湘等三十餘人發表宣言，抗議中共的不仁，直指中國還有一個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個年邁昏庸的獨裁者。「在今天，我們向全中國、全世界宣布，從現在起，同學們一百小時的偉大絕食鬥爭已取得偉大的勝利，同學們已用自己的行動來宣布，這次學潮不是動亂，而是一場在中國最後埋葬獨裁、埋葬帝制的偉大愛國民主運動」^⑥。大陸知識分子的反撲，至此達一高潮，展現了最大的道德勇氣。五月十八日，病中的巴金也發表支持學運的公開信：「七十年前的五四運動，就是一批愛國學生為我們祖國爭取科學與民主。七十年過去了，我們還是一個落後的國家。我認為今天學生們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他們所做的正是我們沒有能完成的事情，中國的希望在他們身上」^⑦。六四慘案後，中國的希望或化成新鬼，或轉入地下，或流亡海外，一時花果飄零。

前此，五月十八日，中共元老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彭真、鄧穎超、楊尚昆、薄一波、王震，政治局常委李鵬、喬石、胡啓立、姚依林，軍委洪學智、劉華清、秦基偉聚會，鄧小平強調，他與其他元老商量，一致的意見是，北京已經不能維持了，必須戒嚴^⑧。李鵬表示，現在每天一百萬人上街遊行，所以他完全擁護戒嚴。會議決定，五月二十一日零時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施戒嚴。由楊尚昆負責，立即部署軍隊行動的計畫，成立戒嚴部隊指揮部。戒嚴後，北京市區的軍隊和武裝警察的兵力增至十八萬人，鄧小平命令，北京軍區的北京衛戍區、二十四軍、二十七軍、二十八軍、三十八軍、六十三軍、六十五軍，瀋陽軍區的三十九軍、四十軍，濟南軍區的五十四軍、六十七軍的相關部隊，分別於五月十九日和二十日，自駐地進駐北京市區的目的地^⑨。至此，中共以兵臨自己的首都，向學生和市民攤牌。稍後，中共得悉戒嚴情況洩露，為防不測，提早於五月二十日上午十時為之。二十日凌晨，李鵬簽署了戒嚴令。

此令發布後，「北京社會各界像炸開了鍋」，抗議者遍布各行各業，其中尤以工人最為突出，他們成立了「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籌備會」，建議全國人大立即召開臨時大會，罷免李鵬和楊尚昆，並應組織特別法庭，公審這些暴君。他們更反對軍管，呼籲市民抵制軍隊進城，也反對獨裁者愚弄軍隊，請求全體官兵調轉槍口，對準這幾

註⑤ 兆強、葛靖、思源編著，*血染的風采*（香港：海燕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六月出版），頁九一。

註⑥ 「北京知識分子『五一七宣言』」，收入張京育主編，*自由之血民主之花—中國大陸民主的坎坷路*，前引書，頁二四八。

註⑦ 「巴金支持學運公開信」，收入*火與血之真相*（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紀實，一九八九年），前引書，頁四一六。

註⑧ 中國「六四」真相（上册），前引書，頁四八一。

註⑨ 中國「六四」真相（上册），前引書，頁四九七。

個暴君。「我們工人階級感謝這些值得中華民族驕傲的大學生，歷史將永遠記住他們。我們將以天安門廣場為戰場，用我們的身體保護大學生及其他絕食者和靜坐者」^④。天安門廣場是中共政權的象徵，根據憲法，政權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如今工人在天安門廣場強烈反抗，中共深感禍患無窮。當天，數十萬學生和市民，在城區的通道上設置路障，截堵軍車，並有六、七萬人在東西長安街和天安門遊行。於此同時，大陸有一百三十二個城市爆發抗議活動，聲討戒嚴令，要求撤銷軍管，「打倒李鵬」是最集中的口號，「鄧小平下台」的呼聲亦可聞之。入夜後，天安門廣場的人數增至三十多萬，戒嚴令的效果不彰，由此可見。

五月二十一日晚間，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彭真、鄧穎超、楊尚昆、薄一波、王震等八名元老，在鄧小平家開會，決定了趙紫陽下台的命運。鄧小平強調，「現在，有很多人的思想都被搞亂了，黨和國家的確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在這個問題上，趙紫陽固執己見，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⑤。他還表示，兩個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後來都在根本問題上，也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上栽了大跟頭。四個堅持最核心是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對立面是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些年來，兩人都未好好執行這些政策。「在這次動亂中，趙紫陽暴露了出來，明顯地站在動亂一邊，實際上在搞分裂，分裂黨，支持動亂。好在有我們在，還能壓壓陣。趙紫陽慫恿動亂，沒有不換的道理，胡啓立也不適合再當常委。不換，怎麼向全黨交代^⑥？」鄧小平此時並無黨職，卻能在一次退休老人的夜談中，換下黨的總書記，實違反中共的黨章，徒然證明外界對其「太上皇」的指控為真。江澤民由陳雲和李先念在會中推荐，後來取趙紫陽而代之。

五月二十三日，北京各界和外地進城的學生數十萬人，一齊走上街頭，這是戒嚴以來規模最大者。二十四日，十萬多名學生在總指揮柴玲帶領下，召開保衛天安門廣場誓師大會。二十五日，同樣人數的學生和市民，在東西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遊行，主要訴求是「立即召開人大緊急會議」、「罷免李鵬總理職務」。二十七日，天安門廣場仍有數以萬計的學生靜坐請願。二十八日，北京各校學生響應「全球華人大遊行」，與靜坐廣場外的外地學生等匯合，據統計，參加的學校超過三百所。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中國社會科學院、首都鋼鐵公司的員工也投入其中。二十九日晚間，中央美術學院等八校的學生，開始在廣場上樹立一尊民主之神石膏巨像，成為精神堡壘。三十日，學生發表「民主之神宣言」：「久違了，民主之神。七十年前，我們的前輩曾高高呼喚過你的名字。爲了你，難道我們還要等七十年嗎^⑦？」數日後，中共用坦克摧毀了這座精神象徵，民主在大陸果然遙不可及。

六月一日，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和北京市長陳希同，奉李鵬的指示，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報告，題爲「關於動亂的實質」，爲天安門的清場合理化。根據彼等不全的統計，從五月二十日戒嚴起，至五月三十一日止，參加遊行示威者，包括高校六

註④ 張良編著，中國「六四」真相（下冊）（香港：明鏡出版社，二〇〇一年四月第一版），頁五五三。

註⑤ 同前註，頁五八八。

註⑥ 同前註，頁五九一。

註⑦ 同前註，頁七九九。

十一所，新聞出版單位六十二個，中央和國家機關一百十二個，民主黨派四個，以及外地三百三十二所高校的來京學生，聲勢可謂驚人。報告最後建議，中共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採取迅速果斷的措施，立即平息在北京的反革命動亂。同日，國安部亦奉李鵬的指示，向中共中央提交另一報告，題為「關於美國等國際政治勢力對我國的思想與政治滲透」，極言美國基於反革命戰略的需要，採取多方面的行動，幻想能夠和平演變中共。同日，戒嚴部隊指揮部報告，只待中央軍委的命令，即可開赴天安門清場。所謂「臨危不惑，治亂不軟，團結一致，鋼板一塊」的保證，益增中共當局清場的決心。同日晚間，北師大講師劉曉波發表絕食演講，抗議以李鵬為代表的政府，用專制的軍管，鎮壓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一日之間，急訊四起，天安門廣場透見了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態。

六月二日，元老鄧小平、李先念、彭真、楊尚昆、薄一波、王震和政治局常委李鵬、喬石、姚依林聚會，鄧小平建議戒嚴部隊指揮部，當晚開始實施清場計畫，兩天完成。「有人說我們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這不對。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我們搞建設，容不得亂。今天來一個示威，明天來一個大鳴大放大字報，就沒有精力搞建設。所以，清場的決心非下不可」^④。鄧小平的「政左經右」政策，於此表露無疑。稍後，楊尚昆主持軍方會議，根據鄧的指示，命令尚在郊外的部分戒嚴部隊，當晚進入北京市區，向目標開進。同日，劉曉波、周舵、高新、侯德健四人，在天安門廣場宣布，開始四十八至七十二小時的絕食，圍觀者近兩萬人。他們呼籲中共消除敵人意識和仇恨心理，徹底放棄階級鬥爭式的政治文化。階級鬥爭是馬列主義的核心，馬列主義又是中共的基本原則，劉曉波等人的言行，鄧小平等當權者斷難接受，反而引為清場的新添理由，非絕食者始料所及。

六月三日，天安門廣場在零時至一時緊急廣播，指出戒嚴部隊開始大批進城，他們坐軍車或其他車輛，著軍服或便服，以多種方式，分途向天安門廣場進發。學生和市民聞訊，立刻到主要通道設置路障。稍後，數千名大學生騎車在長安街上示威。下午，抗議者來到新華門前，數百名軍人阻擋在前，另數百名武警和公安幹警，向六部口的人群施放催淚瓦斯。在中南海西大門、人民大會堂、廣播電影電視部、中共中宣部等處，都見群眾的圍堵。與此同時，楊尚昆、李鵬、喬石、姚依林等召集戒嚴部隊負責人開會，楊尚昆轉達鄧小平兩句話：一、明天天亮前解決問題，二、部隊萬不得已可以採取一切手段^⑤。會議因此決定，於當晚九時起，戒嚴部隊、武警部隊開始平息「反革命暴亂」，北京的公安幹警配合；四日零時，戒嚴部隊抵達天安門廣場，上午六時完成清場任務，不得有誤，如遇阻攔，可以採取各種自衛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這樣的訓令，和鄧、楊所謂「儘力避免流血事件發生」，不免矛盾，結果必然血流成河了。

六月四日，各戒嚴部隊於零時先後進入天安門廣場。二時後，建國門、東單方向傳來密集的槍聲。三時後，尚有三千多名學生圍坐在紀念碑下，侯德健等四人廣播，

註④ 同前註，頁八九〇。

註⑤ 同前註，頁九一二。

希望學生全部撤離廣場。四時整，廣場上的燈全部關閉，當局準備清場。五時許，數千名學生在糾察隊的維護下，向廣場的東南角退去。六時前，天安門的清場過程初告一段落。前此，六月三日晚九時半，三十八軍的部隊開向天安門，在木樨地一帶受阻，十時半左右，部隊向上萬的市民開槍，一時之間，即有上百名學生和市民倒臥在血泊中。四日全天，北京成爲恐怖之城，殺人事件層出不窮。例如，上午六時許，從天安門廣場撤出的學生和市民，陸續到達六部口地區時，就遭戒嚴部隊開槍掃射，士兵並駕著坦克衝向抗議的人群。北京如此，其他各地亦見動盪。從五日到十日，中共中央每天收到近百份的報告，示威的城市多達一百八十一個。十二日，公安部發出搜捕方勵之、李淑嫻的通緝令。十三日，通緝「高自聯」分子二十一人，依序爲王丹、吾爾開希、劉剛、柴玲、周鋒鎖、翟偉民、梁擎墩、王正雲、鄭旭光、馬少方、楊濤、王治新、封從德、王超華、王有才、張志清、張伯笠、李錄、張銘、熊煒、熊焱。十四日，通緝「工自聯」分子三人，依序爲韓東方、賀力力、劉強。二十四日，通緝「北京反革命暴亂的幕後策劃、指揮」七人，均爲著名的知識分子，依序爲嚴家其、包遵信、陳一諮、萬潤南、蘇曉康、王軍濤、遠志明。至六月三十日爲止，僅北京一地，已逮捕「反革命暴徒和動亂分子」一千一百零三人。同日，公安部黨組向中共中央報告，全大陸共取締非法組織五百一十五個，拘捕非法分子四千三百八十六人，破獲三十一起反革命集團案，以及八起台灣國民黨特務案，另有七百一十八名非法組織的領袖登記或自首^④。這樣的規模，實開中國民主運動史之先河，影響力更遍及國外，至今仍爲中共的夢魘。

六四慘案爆發時，中共已建立政權四十年，稍後的十月一日，遂在紅色恐怖中度過。多年後，當局還在拘捕政治異己者，這在中外統治史上並不多見，使得六四無法全然走進歷史，而爲大陸的未來添加變數。慘案爆發前，中共已推行十年的經濟改革，「總設計師」鄧小平，正是派兵鎮壓的定案者，他不惜倒退經濟，也要鞏固政權，此與發動文革的毛澤東略同。第三代領袖如江澤民，原本受益於六四，自然「鄧規江隨」，與其立場一致，視八九民運爲動亂。慘案爆發後，舉世的譴責聲猶存，美國政府即派高級官員充當密使，潛赴北京，向中共保證雙方的關係不變。中共受此鼓勵，繼續發展「強權經濟」，對異己者絕不手軟。然而，動武者仍不免心虛。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鄧小平在中南海，接見戒嚴部隊以上幹部，向全體指戰員表示慰問，一句「同志們辛苦了」，就贏得熱烈的掌聲，說明發號者與執者之間，極需相濡以沫。鄧小平將這次春夏之交的民主運動，定位爲「反革命暴亂」，執行者的舉動，就是「平息暴亂」了。有關人員後來都收到手錶，上面鑄有「平暴紀念」四字，這是鄧小平的禮物。手錶，顧名思義，應戴在手腕上，但是幾乎無人爲之。中共還在執政，「平暴」之說仍在堅持，大小官員與幹部，乃至軍人、公安與武警，都已忙於劃清界線，無人貪功、搶功與居功，說明歷史的評價，早已來到世人眼前，無可遁逃。至於正式的翻案與平反，則必待江澤民下台，乃至其餘受益者退出政治舞台後，始有可能出現。不

註④ 同前註，頁一〇三六。

過，二〇〇一年二月十二日至十四日，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決定六四事件「永遠」不准翻案^⑦。此說出自中共之口，不足為奇，但世間沒有永遠的政治，或遲或速，必將走向公道。

四、比較與結論

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發生於文化大革命後期。毛澤東策動文革的本意，除了牽涉與劉少奇等人的權力鬥爭，更要摧毀所有不同的思想，結果受害者不僅是黨政幹部和知識分子，億萬生靈皆置身一場浩劫中。毛澤東和四人幫的長期肆虐，使得大陸政治動亂，經濟衰退，文化停滯，人民在腥風血雨的歷鍊下，卻也造就了不畏豪強的反抗性格。進而言之，文革造成權威解體，它雖是一枚苦果，皮開肉綻後，核心則顯露了民主的生機，從此一發不可收拾，違反民主的舉措再也不能橫行無阻了。

第二次天安門事件發生於文革結束後十三年。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起，中共進入鄧小平時代。十載以還，鄧小平在經濟上從事改革，在政治上則率由舊章，以一九八三年七月出版的鄧小平文選為例，提及毛澤東之處即達五百二十一次，且語多揄揚。在思想與文藝的領域上，鄧小平更多次扮演了負面的角色，魏京生事件、白樺事件、清除精神污染、方勵之事件、劉賓雁事件、王若望事件、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等，無役不與。最後，他製造了六四慘案。

第一次天安門運動抗議的對象為毛澤東等人，第二次天安門運動抗議的對象為鄧小平等人。鄧小平原與廣大人民一樣，文革時屬於受害者，復出後又推行經改，自易獲得認同，但他的政治意識仍深受毛澤東影響，以致重蹈覆轍，為舉世所責。第一次天安門事件後因禍得福的鄧小平，第二次天安門事件卻避吉趨凶，犯下罪行。究其主因，則在鄧小平一如毛澤東，不知民主為何物，偏偏兩次天安門運動都在追求民主，俱有五四運動的血緣。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日清晨和下午，共軍第二炮兵後勤部和北京總工會的人員，就分別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北面和南側的五四運動浮雕下，展開對當局的迂迴控訴。隨後數日挺身而出者，有退役軍人、老幹部、老科學家、中年教師、機關幹部、工程技術人員、青年工人、學生，以及少年與兒童等，在天安門廣場和東西長安街遊行示威，並發表演說，張貼詩句和標語，同時散發傳單。有人在廣場中央的木臺上高呼：「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不是一小撮野心家的！」獲得了群眾的熱烈響應，也燃起了新時代的五四火炬。

在替第一次天安門運動平反的文字中，有謂可與五四運動媲美，而規模則遠勝之：「四五運動又是一種偉大的繼往開來的青年運動。和五四運動一樣，在四五運動中，衝鋒在前的也是青年。這裏有數量眾多的青年工人，有解放軍戰士，有大學生，有中學生，有剛剛來自田野的下鄉知識青年，還有許許多多戴著紅頭巾的少先隊員，這是一支已經比五四時大大壯大起來的青年運動大軍^⑧。」第一次天安門運動自始即為爭

註^⑦ 特派記者王玉燕北京報導，「六四事件永不准翻案」，聯合報（台北），民國九十年五月二日。

註^⑧ 引自周玉山，「兩次天安門事件」，聯合報，民國七十九年六月五日。

民主的氣氛籠罩，此語道出其中青年的出身，然而他們英勇的表現同時卻被如此認定：「四五運動是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旗幟下的思想解放運動。」中共當權派平反此運動有一目的，即在與四人幫爭馬列主義的正統地位，無怪對四項基本原則仍唱不絕，也無怪衆多參加此運動的青年，後來成爲繼續抵抗的民主鬥士，嚴家其即爲一顯例。中共與大陸青年的距離，可由雙方對第一次天安門運動的評價互異見之，後者不能忍受被四人幫扭曲的真相，又被前者扭曲。

第二次天安門運動因五四運動七十年的激揚而愈勝，更已彰顯於世。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各校學生從海淀區的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出發，在王丹等人的領導下，走向天安門廣場，沿途加入的民衆甚夥。此次遊行的一大特色，是大陸各地二、三十所大學均派代表參加，顯示力量的擴大。五月四日是大陸的青年節，屬於國定假日，趕到天安門共襄盛舉的，包括上海復旦大學、交通大學、合肥科技大學、成都科技大學、天津南開大學、西安交通大學、湖北武漢大學等校學生，香港中文大學亦在其中。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此時發表宣言，強調今天在此雲集，不僅爲了紀念這偉大的一天，還要把五四的民主科學精神發揚光大。「今天，在我們古老民族的象徵——天安門前，我們可以自豪的向全國人民宣稱，我們無愧於七十年前的先驅們。」此語在一個月後獲得更大的驗證。七十年前的先驅在天安門前，無人遭到槍林彈雨的洗禮，一九八九年的大陸青年，卻有多人倒在血泊中。

一九四九年後，中共雖強調科學的作用，卻不重視科學的精髓——民主。大陸近年存在的機構臃腫、貪污充斥、知識貶值、通貨膨脹等問題，都已嚴重到無法遮掩。因此，發揚五四精神、加速體質改革、保障人權、強化法治，成爲大陸現代化建設的當務之急。同時，實現新聞法、允許民間辦報、鏟除官僚、加強廉政、重視教育等，亦爲宣言所念。簡而言之，民主就是集思廣益，科學就是尊重理性，學生希望總結五四以來歷次愛國運動的經驗，使民主和理性成爲一種制度，一種程序，五四的課題才能深化，五四的精神才能光大，中華民族崛起的願望才能實現。令人痛惜的是，此種願望過去被毛澤東封殺，後來又爲鄧小平阻擋。中共在野時利用五四運動，執政後則反其道而行，現代化的道路自然愈走愈遠。

兩次天安門事件的導火線，分別是悼念周恩來和胡耀邦。彼等在大陸享有高度評價，或與未居第一線領導，故不必負第一線罪責有關。第一次天安門運動展開不久即值清明，尚有悼周的形式，第二次天安門運動延續五十天，稍後即無悼胡的稱號，可見悼念死者爲名，抗議當局爲實。周恩來生前提出四個現代化，包括國防、科技、農業、工業，而不及於民主，群衆自不以此爲滿足。學生要求正確評價胡耀邦時，否定「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提倡民主、科學、自由、人權、法治，以及反貪污、反官倒等，內容不止一端，倘胡耀邦在世主政，在同一體制之下，恐亦窮於應付。今日大陸的問題成堆，問題成山，馬列主義的體制不能辭其咎，更不能解其危。

兩次天安門運動另一共同點，在群衆借古諷今，表達對家長制的強烈不滿。毛澤東被喻爲秦始皇，鄧小平被喻爲慈禧太后，形象固定，深植人心。慘案發生後，當局

也都把運動定位為「反革命」。第一次的說詞是：「一小撮階級敵人打著清明節悼念周總理的幌子，有預謀、有計畫、有組織地製造反革命政治事件，妄圖扭轉當前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鬥爭的大方向，進行反革命活動。他們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黨中央領導同志，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④。」第二次的說詞是：「他們散布了大量謠言，攻擊、污蔑、謾罵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現在已經集中地把矛頭指向我們改革、開放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的鄧小平同志，其目的就是要從組織上顛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推翻經過人民代表大會依法產生的人民政府，徹底否定人民民主專政^⑤。」兩相對照，面貌渾似，皆以四項基本原則為準，展現了不分軒輊的專制。

兩次天安門事件的官方，也都強調階級鬥爭。第一次的總結是：「我國無產階級專政是在毛主席領導下經過長期革命鬥爭建立起來的，是廣大人民群眾中生了根的，經過文化大革命，它更加鞏固，更加強大。在社會主義社會，國內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抓住這個主要矛盾，以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為綱，綱舉目張，其他各種矛盾才能得到正確的解決^⑥。」第二次的總結是：「從動亂到暴亂的事件，就有著深刻的國內和國際背景，是階級鬥爭存在和激化的一個典型表現。實踐告訴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仍然存在著特殊形式的階級鬥爭。我們要遵循鄧小平同志的指示，研究在一定範圍階級鬥爭的新的特點，總結在改革開放的條件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新的經驗^⑦。」階級鬥爭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毛澤東疾呼「千萬不要忘記」，造成千萬人民慘死，鄧小平拳拳服膺，對所謂階級敵人也就絕不手軟。

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的劊子手，是工人民兵、公安警察和八三四一部隊。第二次天安門事件的劊子手，是以兩個軍為主的部隊，加上武裝警察和公安幹警。依中共規定，調動軍隊須經中央軍委主席或兩名副主席簽字，當時身為第一副主席的趙紫陽已經失勢，不可能調兵，因此軍委主席鄧小平確是派兵鎮壓的元凶。北京宣布戒嚴後，鄧小平批准了多個野戰軍進城，最後下達了作戰命令，以衝鋒槍和坦克等，面對非武裝的群眾和學生，演出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最大的慘劇。

兩次天安門事件又一共同點，就是傷亡人數成謎。第一次迄無官方統計，非官方的估算是當場打死約兩百人，受傷和拘捕五千人。第二次依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所言，軍警死亡二十三人，受傷五千餘人；非軍警死亡二百一十八人，包括三十六名大學生，另受傷約二千餘人^⑧。非官方的估算則為：群眾學生死亡三千餘人，受傷逾萬，事後追殺者更不計其數。「勿為死者流淚，且為生者悲哀」，殺人機器存在一日，無人可以保證倖免，生者的悲哀因此至深且厚。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站在天安門上，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時距五四運動三十年。八年後，大陸爆發新五四運動，北大學生呼籲大家團結起來，組成有力

註④ 同前註。

註⑤ 同前註。

註⑥ 同前註。

註⑦ 同前註。

註⑧ 中國「六四」真相（下冊），前引書，頁一〇二五。



的十字軍，把中共的統治翻轉過來，鞭撻至粉碎為止。二十七年後，百萬群眾在天安門廣場，投下對毛澤東的否定票。四十年後，天安門廣場更出現了史無前例的抗議人潮，對象則為鄧小平。同樣一個廣場，七十年來面積擴大，人物更替，毛澤東從英雄變成罪犯，且為舉世公認。後來，鄧小平步其後塵，走向歷史的被告席。

兩千多年前，孟子以先知般的聲音，告訴國人要推恩，不要嗜殺。毛澤東和鄧小平不此之圖，分別製造了二十世紀的兩次天安門慘案，前者已應驗了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後者亦不足以保四海。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是陰曆五月一日，後者在這個沒有月亮的晚上，下令廣場關燈，以致西方傳播媒體所能攝取的鏡頭，不及真相的百分之一。然而，百分之一的選樣，已勝過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幾乎全無，它烙在世人心頭，遲遲不能褪色，世人期待廣場的黎明及早來到，代表苦難中國的破曉。

*

*

*

The Two Tiananmen Incidents

Yu-san Chou

Abstract

At the end of March 1976, on the pretext of mourning the death of Zhou Enlai, the mainland people who had greatly suffered und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emonstrated on Tiananmen Square. The demonstration ended in a bloody conflict with the authorities on April 5. The tragedy was known as the April 5 incident and then, after another massacre took place on Tiananmen Square in 1989, was referred to as the first Tianmenan incident. In Mid-April 1989, Beijing students assembled on Tiananmen Square to mourn the death of Hu Yaobang, resulting in the outbreak of a large-scale democratic movement which spread rapidly throughout mainland China. On June 4 of that year, Beijing ordered a military crackdown of the movement, causing heavy casualties. The case was referred to as the June 4 massacre, and also the second Tiananmen incident.

The target of protests during the first Tiananmen movement was the ruling authorities headed by Mao Zedong, while the second Tiananmen movement was a campaign against Deng Xiaoping and other Communist leaders. Deng was formerly a victim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were most of the mainland people. His introduction of economic reforms after his rehabilitation also won him the support of the masses. He was, however, deeply influenced by Mao's political ideology and could not accept democratic ideas. This was the main cause behind the second Tiananmen incident.

The two Tiananmen incidents were touched off respectively by the mourning for Zhou Enlai's and Hu Yaobang's death. Th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irst Tiananmen incident almost coincided with the traditional Qingming Festival (on which Chinese mourn the deaths of their ancestors) gave the campaign an appearance of mourning activity. But the second Tiananmen incident lasted fifty days and mourning for Hu quickly became secondary: the campaign became a protest against the Chinese Communist leadership.

Keywords: May Fourth Movement; April 5 incident; June 4 incident; Mao Zedong; Deng Xiaoping; Zhao ziyang; Jiang Zemin